

1

香港開新篇： 要改革，更要開放^{*}

回歸 25 年，新一屆特區政府要開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提出要「同為香港開新篇」。他曾在競選政綱中強調「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未來施政將「以結果為目標」，帶給市民「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這確實給市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和對未來發展新的希望，筆者認為香港要開新篇，必須要改革，更要開放。

在當前疫情陰霾籠罩、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香港首先要面對防控疫情和疫後重建。但是哪怕恢復到修例風波和疫情以前的發展局勢，難道香港就可以高枕無憂嗎？回歸後長期困擾我們的「深層次矛盾」和發展乏力，難道就會消失了嗎？香港有很多內部問題持續窒礙經濟、社會和創科產業的穩定和發展。面對鄰近地區正在大步向前，香港若不想國際金融中心及龍頭城市地位褪色，絕不能再像以往般故步自封，也不能僅依靠中央政府「送大禮」。香港未

^{*} 本章原載於 2022 年 6 月 20 日《香港 01》港聞周報。

來必須尋找新角色、新定位，從而推動香港真正重新出發。

破除既得利益團體阻撓

從高鐵事件開始，到新界東北發展，再到修例風波，可以看到特區政府現有的諮詢架構和市民參與模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相比內地不斷推進改革，香港確實欠缺改革精神。探本溯源，不僅是由於特區政府遲遲未能下決心清除體制的弊端，社會也未能凝聚改革共識，相關利益團體更是對改革多加阻撓。例如，尤其是隨着英商逐漸撤離、香港本地工業企業北上中國內地發展，本地資源高度向極少數壟斷利益集團尤其是地產商聚集，乃至這些集團成為橫跨地產、電訊、港口、公共交通、燃氣、電力、零售等各個領域的巨無霸。原本的行業協會組織如香港四大商會蚬蟬撼樹，根本無力協調其利益。

更為嚴重的是，不少壟斷利益集團更擁有自己的傳媒機構為自己發聲，建立智庫廣納英才，以資本撬動話語槓桿，甚至資助政黨在立法機構制定遊戲規則，左右特區政府施政。早在回歸前中英博弈的特殊歷史時機中，壟斷商業集團的高層更跳過政府，走「高層路線」進入中國內地的各級人大、政協等政

治機構，並任職至今。可以說，今日港資壟斷商業集團能量之大，影響力之深，早已非港英時代的怡和、和記、太古等大洋行所能比擬。由於「有錢賺、有工開、有飯吃、有房住」不再是香港民眾的必然，而且在「餅」不斷縮水的時代，壟斷商業集團繼續對各行業寸土必爭，鯨吞蠶食，中小企業失去立足之地，普通民眾的發展空間愈來愈狹窄。難見出頭之日的民眾對「官商勾結」愈趨難以容忍，特區政府的管治地位開始動搖，管治危機初現。愈來愈多人開始要求特區政府應當更加為民作主，改善乃至更改「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建立如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着重公平的高福利社會，以保障民眾生活富足。¹

結果就是香港改革延緩，社會、經濟、創科發展都無法向前推進。那麼，該如何推動香港進行改革呢？筆者認為，需要通過開放，以開放促進創新，以創新倒逼改革。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推動香港對外開放，就是向全球尋找新的市場、技術、資本和管理等領域的合作，通過引進新元素，與香港當前既有資源相結合，帶來新的驅動力，打破舊有的秩序。

1. 梁海明：《透視香港的「問題」人群》，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20年2月25日。<https://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86445?archive>（2022年6月瀏覽）。



圖 1.1 1970 年代的香港在麥理浩治下高速發展。

況且，對香港而言，開放、改革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上世紀 70 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實施了一系列對外開放的政策。麥理浩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開放金融業和工業，包括先後撤銷外匯管制、黃金交易管制，取消自 1965 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的規定，又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以及降低港元存款利息預扣稅等放寬外資銀行赴港開業的措施，以此吸引美資、英資金融機構前往香港投資。為了提升香港的工業技術水平，麥理浩還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以此吸引外資前來香港投資工業。²較少為人提

2. 梁可欣編：《最後六任港督的聲音》（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頁 89。

及的是，麥理浩其實也重視向中國內地開放，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問中國的港督，改善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關係，並進一步促進了兩地的交流與合作。

麥理浩對外開放，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最令外界記憶猶新的是，他在任內實施了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推行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等重要改革措施。麥理浩的開放、改革措施，並沒有引來「鯊魚」，而是引來「鯰魚」，並產生「鯰魚效應」，通過內外部的創新、改革，令香港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大都會，奠定重要的基礎。

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要開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提出要「同為香港開新篇」，並強調未來施政將「以結果為目標」，帶給市民「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

跳出「歐美化」國際視野

筆者認為，新一屆特區政府，在中央和新一屆立法會的支持下，絕對可以比當年的麥理浩做得更好。香港應該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也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同時向人才開放，並在香港內部增強開放心

態、凝聚開放共識，無懼「引狼入室」，更要「與狼共舞」，促使香港突破改革樽頸，推動香港再出發。

其一，在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進一步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開放。

過去，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其國際化實際為「歐美化」，多數港人對世界的認知僅僅集中於歐、美、日及中東地區的少數幾國，且僅僅對上述國家中能影響股市、匯市波動的事興致勃勃，沒有興趣全面、深入到經濟、文化、社會及傳統等各個領域中去。對其他的國家，港人往往興味索然，未能及時捕捉到眾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日新月異的變化，令香港喪失了不少發展機遇。當前，隨着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全球經貿秩序將面臨重大轉變，再加上中美關係每況愈下，香港如繼續只重視「歐美化」，優勢將轉為劣勢。

對此，香港可以把更多目光投向國際組織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中挖掘新機遇。除了應盡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加強和東盟國家的經貿、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也可以作為日韓企業進入大灣區的主要平台和跳板。同時，香港應該改變出入境政策，對於 RCEP 國家主動開放

多種簽證，歡迎他們來港營商、投資、就學及通過香港進入內地。

擴大對內地專業開放

其二，在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向內地開放醫療、教育等更多專業行業。

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不少行業發展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際水平。儘管香港的經濟與內地企業和市場關聯緊密，但與此同時，本地行業對內地的抗拒、封閉心態也異常強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累及自身發展。以醫療行業為例，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內地醫護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卻被本地醫療界視為洪水猛獸；內地廉價的檢測資源和試劑，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團極力抗拒，甚至橫加詆毀。到了第五波疫情嚴重，在《緊急法》授權下，才接受一批內地派出的醫護隊伍，而這些醫護對香港的疫情防控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事實上，中國醫護人員曾對逾百個國家及世衛組織、非洲聯盟等國際組織提供過緊急援助，其醫療水平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內地的試劑，更是早已在數億人的龐大樣本中被證實效用。況且，數十萬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也已習慣於內地接受醫療服務。



圖 1.2 2022 年 3 月，香港新冠疫情嚴重，行政長官抗疫記者會宣佈接受一批內地派出的醫護隊伍，協助防控疫情。

讓筆者感到欣慰的是，《2021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通過後，持認可醫學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如符合相關條件可申請特別註冊途徑來港，於公營醫療機構（即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衛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醫生工作，並在服務一定年期、取得認可專科資格及通過評核後獲得正式註冊在港執業行醫。這是一個進步，但第一批公佈的 27 個大學全部都是西方國家的大學，直至第二批名單才僅有上海復旦大學入選，但其入選的課程亦是培訓國際學生為主。而且計劃只限香港永久居民在外地培訓也不理想。想想看，培養一個醫生要投入多少資源？如果有內地甚至外國居民願意來香港做醫生，是對香港

的貢獻，根本應該把醫生列入專才優才計劃，讓香港市民能夠享受到與這個城市匹配的醫生數量。

開放教育行業的意義則更為深遠。2021 年筆者在全國人大提出的「爭取內地機構來港興辦中小學校建議」，得到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積極回饋。要引進內地學制的中學，就需要引進內地的教育機構、人才來港辦學、任教。2022 年筆者再提出「關於鼓勵國家頂尖高校在香港設立校區的建議」，早期可以先集中設研究生院和研究院，也可以與相關大學的大灣區校區聯合起來，讓學生可以在兩地修學分。同時建議特區政府放寬私立大學對於境外本科學生限制的上限，鼓勵大學針對東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招生。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政府缺乏吸引人才的政策，即使推出「專才」、「優才」計劃吸引全球人才，但實際上門檻甚高。

廣納全球優才追尋「香港夢」

其三，香港特區政府要加大對人才的開放政策。

長期以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政府不僅缺乏吸引人才的政策，甚至存有不少「反人才」政策。特區政府早期的入境條例，是以不影響本地就業為前提，從而盡量刁難到香港工作的人才。雖然其後特區

政府逐漸改善這些「反人才」政策，推出「專才」、「優才」計劃以吸引全球人才，但實際上門檻甚高。直到 2018 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人才清單」，才第一次提出在某些緊缺專業領域，可以毋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香港本地僱主聘任，但每年也僅有 1,000 個名額可供申請。

反觀美國，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前，每年都發放 85,000 萬個 H-1B 簽證，供全球人才申請。其中 20,000 個簽證是給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其餘的則只需持有本科學位即可。事實上，要發展經濟、創新產業，僅靠博士和博士後人才並不足夠，同時也需大量來自全球的本科、碩士學位人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無論大小，其人才儲備基本都來源於國民，但美國的人才政策則可以從全世界 60 億的人口中，招募各類優秀人才為其所用，從而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科技強國。

歐洲同樣有此類優秀案例，在丹麥和瑞典的交界處、由厄勒海峽大橋連接在一起的「厄勒地區」，有來自兩岸的九所大學，16.5 萬學生和 12,000 名研究人員在此建立了聯繫、合作。大量研究項目得以跨越地區界限，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豐富的人力資源來開展，瑞典不但獲得直通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新通道，丹麥的哥本哈根機場作為北歐國家中最繁忙的國際機